

中东地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探析： 新特点、成因与影响^{*}

马小东

摘 要：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中东地区存在已久。2011 年中东剧变以来，新型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断产生。新旧团体叠加共振，呈现出新特点：在规模上，数量更多，碎片化程度更深，性质更为多元复杂；在能力上，军事打击能力、筹措资金能力、治理能力等各方面都有所加强；在与国家关系上，互动模式复杂多样，边界日益模糊。当下，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角色更显突出的原因如下：一是国家结构不断受到侵蚀，中央权力衰弱，治理能力滞后；二是美国持续的霸权行径导致武装团体此起彼伏；三是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势力的支持；四是新技术的发展赋能武装团体发展。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发展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多重影响：从国内看，与中央政府展开竞争，加大本就脆弱的国家整合难度；从地区看，跨境行动增加国家间冲突几率；从全球看，加剧大国在地区内博弈并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面对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国际社会应以更精细的视角审视其影响，在国际规范与具体策略间寻求动态平衡。

关 键 词：中东安全；内战；非国家武装行为体

作者简介：马小东，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师资博士后，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6-0078-2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全史”（24VLS025）的阶段性成果。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NSAAs,以下简称“武装团体”)指有能力系统性实施暴力以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的非国家组织。^① 2023年10月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和部分伊拉克武装团体与以色列的对抗凸显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中东安全 and 国家间关系的重大影响。冲突两年后,哈马斯和真主党虽遭到不同程度削弱,但并未完全消失。2025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承认,哈马斯仍有数万之众,难以根绝。^② 同年9月,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的一份报告认为,尽管哈马斯损失惨重,但仍在通过分散的小组运用游击战术进行抵抗。^③ 真主党军事上遭受重创,但其政治影响力仍在。^④ 而且,也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等国的武装团体依旧强大。因此,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仍是中东政治安全中最突出的角色之一。

实际上,不少武装团体已经发展成为中东乃至全球范围内显著的政治安全现象。^⑤ 据国际红十字会统计,全球有1.95亿人生活在受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同程度控制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和中东。^⑥ 因此,在这个由国家主导的世界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再是次要角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不是国家政权唯一的组织形式、国内所有暴力的垄断者和国内所有合法性的拥有者。

① 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定义可参考 Keith Krause and Jennifer Milliken, “Introduction: The Challenge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0, No. 2, 2009, p. 202; Anthony Vinci, “Anarchy, Failed States and Armed Groups: Reconsidering Conventio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 229.

② Yonah Jeremy Bob, “IDF Sources Admit It May Take Years to Root Out all Hamas Terrorists in Gaza — Exclusive,”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9, 2025,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defense-news/article-849537>, 上网时间:2025年5月6日。

③ Ameneh Mehvar and Nasser Khmour, “Gaza After Two Years: As Israel Expands Control and Sows Chaos, Hamas Adapts to Survive,” *ACLED*, September 17, 2025, <https://acleddata.com/report/gaza-after-two-years-israel-expands-control-and-sows-chaos-hamas-adapts-survive>,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10日。

④ Michelle Nichols, “At UN, Israel Accuses Hezbollah of Trying to Rebuild with Iran’s Help,” *Reuters*, January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n-israel-accuses-hezbollah-trying-rebuild-with-irans-help-2025-01-13/>, 上网时间:2025年5月6日。

⑤ Peter G. Thompson, *Armed Groups: The Twenty-First-Century Threat*,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24, p. 1.

⑥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the Sahel: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in Today’s Conflicts,” *IISS Report*, January 25, 2024, <https://www.iiss.org/events/2024/01/from-the-middle-east-to-the-sahel-the-enduring-relevance-of-non-state-armed-groups-in-todays-conflicts/>,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在部分国家,武装团体甚至成为“准国家”。^①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武装团体并非中东地区新的政治安全现象。中东国家 20 世纪陆续取得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以来,武装团体就始终存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在地区内都扶植了一定数量的亲己武装,如苏联支持的左翼团体佐法尔解放阵线(DLF)和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FLOSY)等。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伊斯兰主义的蓬勃发展,各类具有伊斯兰主义底色的武装团体开始登上中东政治安全舞台,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武装小组(GIA)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LIFG)等,其中的“翘楚”当然要数“基地”组织。以库尔德工人党为代表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自 70 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寻求独立建国。80 年代,黎巴嫩内战催生出日后强悍的真主党。90 年代,索马里的奔溃导致伊斯兰法院联盟(ICU)等为数众多的武装团体在该国兴起。以苏丹人民解放军(SPLM,1983~2011)为首的分离主义武装团体长期寻求苏丹南部独立。此外,中东还存在一类特殊的武装团体,即与巴勒斯坦问题紧密相连的一系列组织,如早期的巴解组织以及杰哈德和哈马斯等。它们的定性从恐怖主义到民族解放运动不等,主要取决于定性者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

21 世纪以来,武装团体横向发展,产生了比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数量更多的新武装。^② 世纪之初,达尔富尔地区的长期冲突造就了数个亲政府武装(如金戈威德民兵)和反政府地方武装(如苏丹解放军)。“基地”组织袭击美国行为的模仿效应催生了更多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颠覆中央政权和中央暴力机构,在伊拉克催生了诸多以教派和地域为界的武装。2011 年中东剧变,多个国家政权遭到更迭或削弱,武装团体更是“如日中天”,暴力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多。^③ 中东出现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生态系统,已成为塑造地区政治格局的关键因素和地区大国间竞争的重要工具(见表 1)。

① Phil Williams, “Violent Non-State Actors 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TH Report*, 2008, p. 4.

② Therése Pettersson and Kristine Eck,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7,”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5, No. 4, 2018, pp. 535–547.

③ Carmit Valensi, “Alliances with Violent Non-State Actors in Middle East Conflict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EMed Mediterranean Yearbook*, 2021, p. 239.

表 1 中东地区主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概览

武装团体	与国家关系	组织特点	目的/意识形态	主要外国支持者
黎巴嫩真主党	嵌入/合作	组织化程度高、结构复杂	什叶派、抗以、抗美	伊朗
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	嵌入/合作	松散的伞式组织	什叶派武装	伊朗
佩什梅格武装	独立/合作	武装团体联盟	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武装	西方国家
胡塞武装	对立	组织严密、高度集中、相对灵活	教派武装	伊朗
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	对立	组织架构灵活,地方指挥官自主权较大	在叙利亚实现库尔德人的自治和民主自治	美国
叙利亚国民军(2017-2025)	对立	松散的武装团体联盟	/	土耳其
利比亚国民军	对立	中央集权、等级制	武力统一利比亚全国	俄罗斯、埃及
哈马斯	对立	领导结构分散、地方指挥官自主性强	抵抗以色列	伊朗、土耳其
苏丹解放军(SLA)	对立	指挥体系分散、地方指挥官自主性强	抵抗中央政府	南苏丹、乍得、利比亚等
金戈威德	合作	指挥结构相对分散	阿拉伯部落武装	阿联酋、俄罗斯
索马里青年党	对立	组织架构灵活,地方领导人自主权高	恐怖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	/
“基地”组织	跨国组织	高度分散、灵活	恐怖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	/
“伊斯兰国”组织	对立	中央集权、高度组织化	恐怖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	/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那么,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为什么能够如此“蓬勃”发展?不同类型武装团体之间有哪些共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地区秩序和安全?

长期以来,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虽然也是国际安全研究文献中主题之一,但主权国家传统上被视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对象。它们既是威胁最主要的感知者和发出者,也是地区安全和秩序的基石。根据理性主义的假设,国家作为具有理性决策能力的主要行为者争取更多权力和影响力的观点已有几十年的历史。^① 因此,在中东安全研究文献中,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历史上,阿以冲突被视为中东冲突的核心,2023 年巴以冲突之前的历次阿以冲突的基本形态是国家间对抗。^② 域外大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被视为是影响中东因素的主要负面因素之一,大国干预的对象往往是中东主权国家。^③ 中东安全中其他突出领域,如水资源争端、难民问题、军控问题、发展赤字、边界争端等的主体基本都是主权国家。^④ 在次国家层面,既有文献主要关注国家内部的族群冲

① 参见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Michael C. Williams, ed.,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Legacy of Hans Morgentha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971-991;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1992, pp. 177-198; William E. Scheuerman, *Hans Morgenthau: Real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Stephen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in John A. Vasquez & Colin Elman,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2003; Jonathan Monten, "Thucydides and Mod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1, 2006, pp. 3-25。

② 参见 Chaim Herzog, *The Arab-Israeli Wars: War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4。

③ 王京烈:《中东地区安全与大国干涉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6 期,第 40-46 页; Peter Mangold, *Super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J. C. Hurewitz, ed., *Soviet-American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④ 参见杨光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16(2013-1024):盘点中东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邓红英:《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Peter Seeberg and Zaid Eyadat eds., *Migration, Securi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Middle East: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Clive Lipchin, et al., eds.,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突,教派对立。^①也有文献关注到次国家行为体层面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中东安全的塑造能力越来越强。^②还有部分文献对哈马斯、真主党等特定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做了深入研究。^③在跨国以及地区层面,既有文献主要关注跨国恐怖组织及其对中东秩序的破坏。^④“9·11”之后,对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跨国恐怖组织的剖析更是全面深入。

尽管如此,既有中东安全研究仍有以下不足:一是对中东安全的分析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对象和视角,对次国家行为体塑造地区秩序的关注不足。分析中东地区各类冲突,需将武装团体放到突出位置考量。它们不是国家,但也不是普通的非国家行为体。尽管没有被正式承认为主权行为者,但有能力坚持自治和独立,拥有其它非国家行为体所没有的事实上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武装团体是当今中东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军事领域很多问题的症结。二是很多既有文献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叛乱等威胁,将武装团体视为国内叛乱组织和不稳定因素,只将其视为问题。实际上,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类型多样,性质复杂,部分武装团体“统治”着大片土地,具有相当的治理能力,它们既是“问题”,也可能是“解决方案”。反恐反叛乱视角忽略了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存在的积极意义,也不利于对其本质的认识和提出正确的应对政策。三是孤立地研究某一类型的武装团体。如对真主党、哈马斯、库尔德工人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影响力较大的组织有非常深入的垂直研究,但缺乏对不同类型武装团体的纵向对比和一体化研究,虽然

① 参见王凯:《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的历时比较研究》,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4期;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王宇洁:《当代中东伊斯兰教教派冲突:神学还是政治?》,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② 参见 Tami Amanda Jacoby and Brent E. Sasley, eds., *Redefining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

③ 参见陈天社:《哈马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叙利亚]肖克(Karim Alwadi):《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参见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肖宪:《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James Fromson and Steven Simon, “ISIS: The Dubious Paradise of Apocalypse Now,”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7, Issue 3, 2015; Daniel Byman, “The Homecomings: What Happens When Arab 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 Retur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8, 2015.

中东武装团体多样化程度高,但绝大部分武装团体产生的根源类似,在与国家关系、与当地民众关系、与外部关系、组织架构、战略目标等诸多维度都有类似的方面。

因此,有必要对中东地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进行更为系统性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从 21 世纪以来武装团体的新特点、产生根源以及对地区政治安全的影响等方面对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进行深入分析。

二、中东剧变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新特点

武装团体是中东政治安全领域早已存在的现象。但 21 世纪以来,其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其一,规模方面,数量更多,碎片化程度更深,性质更为多元复杂;其二,能力方面,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军事打击能力、筹措资金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甚至对外交往能力等综合能力都有所加强;其三,与国家关系方面,二者关系更加复杂,不是叛乱—反叛乱,恐怖—反恐框架能完全涵盖。

(一) 规模维度:数量持续增多,组织更趋碎片化

当下活跃于中东的武装团体,既有 20 世纪后半叶产生于各种冲突的老牌武装,也有 21 世纪以来因数个国家政权更迭而产生的新武装。2003 年伊拉克政权被颠覆,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去复兴党化,军事、安全和情报机构解散,大量恐怖团体和地方武装得以滋生。同年爆发的达尔富尔战争绵延跌宕,催生了大量反政府叛乱武装和亲政府民兵武装。2006 年,真主党和以色列直接爆发冲突,真主党击退以军,宣示其发展进入新阶段。2011 年中东剧变颠覆和削弱了数个阿拉伯国家政权,导致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地方武装迅速崛起并割据。期间,巴以冲突断断续续,间歇性爆发。由此,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数量急剧增加。叙利亚内战最激烈的时候,约有 5,500 个武装团体活跃于前线。^① 联合国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在 2019 年统计出与民族团结政府联盟的武装团体有 49 个,与东部利比亚国民军联盟的武装团体有约 61 个。^② 伊拉克

① “Syria Countrywide Conflict, Report 3,” *The Carter Center Report*, March 14, 2014.

② UN Security Council, “Final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Libya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3 (2011),” S/2019/914, December 9, 2019.

大约有 180 个武装团体,^①15 万名民兵。^② 在也门,仅胡塞武装成员就有 35 万之众。^③ 如图所示,根据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 (UCDP) 的统计数据,1946 至 1975 年,中东每年新产生的武装团体数量相对稳定,且数量较少,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新武装团体数量有所增加,进入 21 世纪,尤其 2011 年后,新产生的武装团体数量大幅增加(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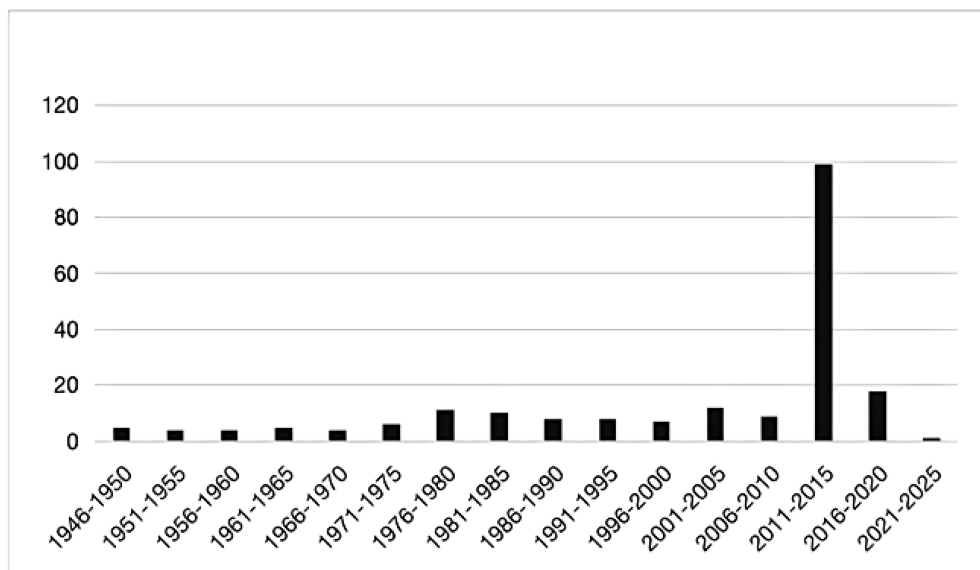


图 1 1946 年以来中东每五年所产生的武装团体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结合 UCDP 数据库数据整理自制。^④ 参见“UCDP Actor Dataset version 25. 1, <https://ucdp.uu.se/downloads/index.html#armedconflict>,”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20 日。

从武装团体互动角度而言,相互对立程度和碎片化程度不断加深,加剧国内政治僵局。在利比亚,国家层面自 2014 年起形成了东、西两大武装团体联盟体

① Tramer Badawi, “Iraq’s Resurgent Paramilitaries,” *Carnegie Report*, April 22, 2021.

② Vanda Felbab-Brown, “Pitfalls of the Paramilitary Paradigm: The Iraqi State, Geopolitics, and Al-Hashd al-Shaabi,” *Brookings Report*, June, 2019.

③ “UN Expert: Iran Transformed Yemen’s Houthi Rebels into Potent Military Force,” *VOA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3, 2024, <https://www.voanews.com/a/un-expert-iran-transformed-yemen-s-houthi-rebels-into-potent-military-force/7849814.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6 日。

④ 相关数据说明:UCDP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为 1989-2025 仍然活跃(至少参与一起有组织暴力事件)的各类行为体,作者剔除了政府、民众和政治党派等非武装行为体,然后查找出剩余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产生年份,进而制作成该图。

系,军事上无法相互吞并,政治上难以妥协,统一选举无望。^① 在伊拉克,武装团体不仅有库尔德、逊尼派和什叶派等种族和教派之分,在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内部,武装派系间斗争日益白热化。2021 年 10 月选举后,伊拉克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自 2003 年以来最严重的选举后暴力事件。人民动员部队(PMF)和萨德尔派系武装及其盟友针锋相对,暴力冲突不断。库尔德政党在 2005 年推动修改伊拉克宪法,确保库尔德武装的指挥链牢牢掌握在地区政府手中。^② 也门各方冲突虽在 2023 年有所平息,但离永久停火仍遥遥无期,胡塞武装、南部分离主义武装、为数众多的部落武装、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和也门“伊斯兰国”的存在使也门冲突更加复杂。2025 年初成立的叙利亚新政权,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相互竞争的结果。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更是四分五裂,叙利亚将走向军阀化,还是能够成功组建新的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仍需观察。总之,21 世纪以来,中东武装团体数量不断增多,形态上碎片化加剧,导致了数个国家以及整个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马赛克化。

(二) 能力维度:综合实力逐步提升,行动效能增强

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仅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单纯军事组织的政治经济军事复合体。当前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数量众多,能力参差不齐,很难一概而论,但整体而言,它们的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治理能力等关键能力趋于加强。

首先,武装团体与国家或其它行为体竞争的最核心的能力是军事能力,部分武装团体的军事能力增加到超越国家军队的程度。在部分国家,随着中央政府失去对暴力的垄断,政府也失去了对军事主动权的控制和对军事技术的主导。^③ 冷战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小型武器的全球扩散,突击步枪、冲锋枪、火箭榴弹等小型武器价格低廉,易于使

① 马小东、王广大:《城市政治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以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中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30 页。

② Renad Mansour, “The Political Logic Behind Iraq’s Fragmented Armed Forces,” *MERIP*, Spring 2023, https://merip.org/2023/04/the-political-logic-behind-iraqs-fragmented-armed-forces/#_edn2,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6 日。

③ Aaron Karp, “The Changing Ownership of War: States, Insurgencies and Technology,” in Keith Krause, ed., *Armed Groups and Contemporary Confli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4.

用,很容易从黑市获得,逐渐成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标配。^① 21 世纪以来,低成本、易流通、易获取,但具有高威胁的导弹和无人机等远程技术的发展,再次赋能武装团体军事能力,赋予了它们之前所没有的监视、情报收集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军事能力,成倍放大武装团体“非对称作战”优势,赋予它们之前没有大量资源就无法实现的战略影响力,使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获得了一定的制空能力,增强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以小搏大的军事能力。

在中东战场上,美以过去完全掌握着地区制空权。但如今,能够观察到,真主党已经能够利用无人机深入以色列中南部进行侦查和精确打击。2024 年 10 月遭遇毁灭性打击前,真主党号称中东最强武装团体。^② 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飞越一千多公里打击以色列领土而无法被拦截,胡塞武装也已数次击落美国先进的死神无人机。虽然这些攻击对敌人伤害有限,但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敌人心中造成恐慌和威慑。

其次,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经济能力不容忽视,经济能力是武装团体最重要的权力支柱之一。中东长期的冲突环境造就了所谓的“冲突经济”。冲突经济最重要的一个体系是武装团体对经济资料的攫取、分配和利用。武装团体在国家经济结构之外试图建立平行实体,取代国家机构,试图控制经济部门和资源。

武装团体的经济来源通常有以下几类:一是从国家资源和国库中获取经济支持,如利比亚相当一部分石油收入流向了各类名义上隶属于国家的武装团体,正是利比亚的石油收入维持了武装团体的存在。同样地,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伊拉克武装都利用国家石油资源等国家资源发展壮大。二是从事各类非法和合法贸易,如买卖毒品、人口、武器、燃料和原油等。据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估计,伊拉克汽油走私量达到每天 700 万升,约占该国日总产量的一半。^③ 在叙利亚,武装团体以生产、贩运和销售芬乃他林(Captagon)等毒品而闻名,该行业价值数十

① Michael T. Klare, “The Deadly Connection: Paramilitary Bands, Small Arms Diffusion, and State Failure,” in Robert I. Rotberg, ed.,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4.

② Israel Shamay and Makor Rishon, “World’s Most Powerful Terror Group: Hezbollah’s Full Arsenal Explained,” *Israel Hayom*, September 28, 2024,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4/09/28/worlds-most-powerful-terror-group-hezbollahs-full-arsenal-explained/>,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③ Laura Adal and Sarah Fares, “Smuggling, Subsidies and Shortages: Iraq’s Latest Oil Troubles,” *Global Initiative*, February 10, 2023, <https://globalinitiative.net/analysis/iraq-oil-smuggling/>, 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亿美元。^① 三是控制边境口岸、港口、机场、境内沿途关卡以及首都公共机构等关键设施,进行变现,变现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收取过路费和敲诈勒索等。以伊拉克为例,伊拉克时任财政部长阿里·阿拉维(Ali Allawi)2020年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透漏,尽管政府预计每年获得9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但80亿美元在回到政府金库之前消失。^② 以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为代表的武装团体不仅参与军事行动,而且还控制着国家经济部门。^③ 它通过在伊拉克各省设立独立办事处,扩大在几乎每个部门的影响力,广泛地参与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以及各类犯罪经济活动。^④ 四是税收。税收不仅是武装团体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其实践治理,树立权威的重要途径。胡塞武装2015年接管了一部分国家资源后,跃升为中东最富有和最有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在经济能力方面,胡塞武装主要的六大资金来源中的三项都和税收有关,分别是关税、国内贸易等商业性税收和天课等宗教税收收入。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所造就的经济网络对中东经济秩序的重大挑战在于,武装团体的经济和金融存在已在国家、人民和国家预算的日常生活中正常化,和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混为一体。

再次,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最令国家畏惧的能力之一是治理能力。传统政治理论认为,主权国家是任何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来源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失败和脆弱国家在安全、合法性和能力方面的不足,导致了复杂多样的治理赤字,为武装团体提供了治理机会和空间。它们有意识地发展治理能力,实施有效治理,为自身事业获取话语权、合法性、资源以及成员。在中东地区,国家并非唯一的治理者,治理由多层次行为体组成。国家权力延伸不到的地方为武装团体提供了与正式政府权力竞争或分享权力的空间。武装团体能够实施长期有效治理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治理目标、治理基础和治理能力。治理目标之一是获

① Hesham Alghannam, “Border Traffic: How Syria Uses Captagon to Gain Leverage Over Saudi Arabia,” *Carnegie*, July 9, 2024, p. 2.

② Patrick Wintour, “Iraqi Deputy PM Says Economy in Crisis and ‘Riddled with Corruption’,” *The Guardian*, 24 November,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nov/24/iraqi-deputy-pm-says-economy-faces-existential-crisis>, 上网时间:2025年3月12日。

③ Farouq Yousif, “The Rise of the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Threatens Iraq’s Future and Its Statehoo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ranian Studies*, November 19, 2020, <https://rasanah-iiis.org/english/monitoring-and-translation/articles/the-rise-of-the-popular-mobilization-forces-threatens-iraqs-future-and-its-statehood/>, 上网时间:2025年3月12日。

④ Kardo Rached, “Financing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Iraqi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PMF) as a Case Stud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December 28, 2022, p. 3.

得合法性,它们通过向对手展示道德优势,通过成为控制地区的事实政府,建立公共和社会服务网络,成立平行法院和警察机构,实施税收等措施来证明其合法性。同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展现出了不同于基地组织的治理野心和能力,一度宣布“建国”,并建立一整套国家体系。

总之,武装团体的治理反应出的是国家治理的缺位。国家治理缺位的情况下,地方秩序会自然生产。武装团体不仅通过强制、提供公共产品等物质力量强化治理,也诉诸意识形态、宗教和习惯治理形式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取得统治地位,获得政治主体性。很多地方武装的韧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实地治理方面胜过政府和与政府结盟的权力掮客。这种情况下,武装团体不仅仅是威胁源,也可能是地方秩序的提供者。

(三) 国际关系维度：互动模式复杂多样,边界日益模糊

传统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无论是叛乱组织、分离组织,还是恐怖主义,都处于国家的绝对对立面,是国家努力消灭的对象。但当下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复杂,它们与政府若即若离,有时合作,有时对立,介于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武装部队和完全处于国家对立面武装组织(反叛组织和恐怖组织等)的中间地带。可能隶属于正式的国家机构,但保持着独立的指挥链条,甚至控制着政府。它们最主要的特点是既具有国家性,也具有非国家性。这类武装行为体通常被笼统地称为混合武装团体。^①

武装团体现象并非中东地区独有,但中东混合武装团体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与国家的共生关系,已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个持久特征。^② 这类武装团体不仅与国家共存,而且被国家拉拢,国家与非国武装团体间存在事实上的联盟。这些团体中最具影响力的往往占据国家机构,分享国家权力,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正式治理。寻求国家资助和合法性驱动武装团体融入国家。同时,它们也可能成为重建国家权力的最大障碍。

真主党 1985 年成立时意识形态是反国家,彻底否认黎巴嫩现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③ 但真主党 1992 年开始进入议会,2005 年加入政府内阁,逐渐融入国家框架,实现自身的“黎巴嫩化”。在 2009 年的纲领性文件中,已经不再传播建设

^① Thanassis Cambanis, et al. *Hybrid Actors Armed Groups and State Fragmen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19, p. ix.

^② Ibid., 2019, p. 2.

^③ 李福泉:《黎巴嫩真主党政治参与解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46 页。

伊斯兰国家。^① 如今,已经从民兵组织转变为黎巴嫩的主导政治力量,控制着议会 12% 的席位并掌管劳工部。^② 在利比亚,武装团体名义上都隶属于内政部、国防部、总统委员会等国家机构,即使是国民军也以东部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为其做橡皮图章,但却保留着独立的指挥链条和忠诚对象。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的角色从 2017 年后开始从恐怖分子的抵抗者向国内政治的参与者转变,影响力已经渗透入各层国家机构,在议会、政府、法院和安全部门等多个政治场域拥有重要权力。^③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也是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战争中扶植的地方武装,2013 年被纳入国家机构,但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并未完全融入现有的安全和国防结构,才导致 2023 年它和国家军队因争夺权力而爆发内战。当前苏丹的拉锯战也表明,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发展而来的快速支援部队,实力不输国家军队。事实上,很多武装团体的实力与国家武装相当,甚至强于国家武装。如真主党武装强于黎巴嫩政府军,它有权决定是否将国家拖入一场对外战争。武装团体与国家能够形成事实上的联盟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央政府过于软弱,为了保障政权安全,只能与武装团体妥协,达成互惠联盟。如 2015 年,在联合国帮助下利比亚组建的西部政府到达的黎波里后,只能依赖在首都拥有实际权力的武装团体保护。此后,西部政府与部分首都武装结盟成为它主要的存在形式。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崛起的直接原因是伊拉克政府军无力抵抗“伊斯兰国”的攻城略地。

第二,对偏远地区直接统治的成本过高,政府利用武装团体实施“间接统治”。武装团体通过提供国家无法或不愿提供的服务来补充国家的治理职能。对于一些偏远地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成本或者安全成本过高,倾向于利用武装团体作为“代理人”,对不易控制的地区施加影响。当前与苏丹政府军作战的快速支援部队的前身是 2003 年达尔富尔战争中巴希尔支持建立的部落武装金戈威德(جنجويد),该武装协助苏丹国家武装镇压叛乱。再如某些军阀和民兵组织,它们有利于打击恐怖分子时,政府会选择与之合作或被默许它们的存在。^④

第三,中央政权混乱,权力斗争激烈,政治精英与武装团体结盟,将其作为权

① [叙利亚]肖克:《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第 111 页。

② “The Middle East Has a Militia Problem,” *The Economist*, April 25, 2024.

③ Renad Mansour, “Networks of Power: The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and the State in Iraq,” *Chatham House Report*, June 21, 2021, p. 18.

④ Ashley Jackson, *Negotiating Survival: Civilian-insurgent Relations in Afghanistan*,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21, p. 93.

力的延伸、安全的保障和争权夺利的工具。部分国家政治体制并不健全,政治精英间信任裂痕明显,国家领导人宗派主义明显,国家机构往往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武装团体成为权力斗争在体制外的后备力量。如在利比亚,西部政府总理德贝巴与东部政府总理(2022~2023)巴沙加各自与部分首都武装和米苏拉塔武装分别结盟,两者的权力斗争导致了2022年8月两者在的黎波里爆发大规模冲突,德贝巴最著名的支持者如首都武装稳定支持机构(SSA),直接隶属于总统委员会之下,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安全机构。^①再如在伊拉克,统治精英普遍与武装团体结盟,互不信任的政治派别依赖私人准军事组织来维持其权力和影响力。国家精英彼此并不信任,拒绝放弃直接使用暴力,政府机构和武装团体并行运作。这种私下和直接的暴力手段已成为谈判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2021年10月选举后,伊拉克利用武装团体争取政治目的的现象非常突出。^②

因此,随着中东武装团体的发展,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已远不是叛乱—反叛乱,恐怖—反恐怖二元对立模式所能涵盖,其与政府的关系越发复杂,呈现出从相互对立到相互水乳交融的复杂谱系,成为21世纪以来武装团体发展的新特征之一。

三、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长期存在的核心成因

中东武装团体种类和性质千差万别,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有反抗中央政权(因教派、部落、种族差异,资源分配等原因而实施的)压迫和边缘化政策的反叛组织、分离组织,有反抗西方霸权的强权组织,有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组织,有外国扶植的恐怖主义团体,也有中央政权被颠覆后相互争权夺利的民兵和军阀等等。世界各地武装团体的产生原因,亦大致如此。但中东武装团体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十年而不绝,不同时期总能出现不同类型武装,不断扩散,与以下三个因素密不可分:一是国家结构和机构长期受到侵蚀,中央权力衰弱,职能缺失,治理能力滞后;二是美国在中东长期的军事存在和霸权行径不断催生各色反霸

① “Libya’s SSA Security Force Accused of Abusing Migrants,” *Infomigrants*, July 22, 2022, <https://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2104/libyas-ssa-security-force-accused-of-abusing-migrants>, 上网时间:2025年3月4日。

② Renad Mansour, “The Political Logic Behind Iraq’s Fragmented Armed Forces,” *MERIP*, No. 306, Spring 2023, <https://merip.org/2023/04/the-political-logic-behind-iraqs-fragmented-armed-forces/>, 上网时间:2025年6月3日。

武装；三是中东是全球大国、地区强国高度竞争之地，相互竞争的外部势力支持武装团体发展；四是不断产生的新技术持续赋能武装团体，增强其生存和延续能力。这些因素引发了无休止的内战和地区战争，导致武装团体产生和扩散，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秩序的新变量。

（一）内部根源：国家中央权威衰落，治理能力显著滞后

非国家行为者在中东扩散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国家结构的衰落。国家衰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之间存在互构关系。^① 武装团体研究专家安东尼·芬奇 (Anthony Vinci) 认为：“随着国家的削弱，武装组织——有能力采取系统性军事行动的非国家组织——可能会变得相对更加强大。”^②20 世纪，中东国家相继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拥有稳定的中央政权，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活动空间有限。因此，20 世纪中东武装团体的主要类型为：民族解放运动，如巴勒斯坦系列武装；寻求独立的库尔德系列武装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兴起的伊斯兰武装、极端武装和恐怖分子。进入 21 世纪至今，近三分之一阿拉伯国家政权遭到更迭，部分至今仍未建立起中央政权，导致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盛行。国家衰落导致武装团体的具体机制如下。

第一，国家结构衰落意味着国家部分地失去对暴力的垄断，对领土和边境的完全控制，缺乏对本国及外来武装团体的监管和打击能力，更容易成为它们的避风港和滋生地。^③ 失去对暴力的垄断，一方面意味着缺乏监管武装团体的力度和打击它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武装团体分享国家暴力，更容易地以暴力实现其目标。武装团体在该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运营，更便捷地汇集人力物力资源，遭受政府军打击的可能性较小。“伊斯兰国”的崛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东剧变严重削弱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家能力，“伊斯兰国”分子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肆意流动。2011 年后利比亚各地武装团体壮大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构解除各地武装，反而只能依赖它们保护国家机构和边境。武装团体在靠近突尼斯边境、南部边境、埃及边境和苏丹边境地区“监守

① Klejda Mulaj, *Violent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

② Anthony Vinci, “Anarchy, Failed States, and Armed Groups: Reconsidering Conventio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 299.

③ 参见 Robert Rotberg, “The Failure and Collapse of Nation-States,” in Robert I. Rotberg ed.,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10.

自盗”，将边境变成谋利的工具。

第二，国家衰落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无法为民众提供安全、基础服务、经济机会等最基本社会公共产品，造成社会公共产品真空，无法满足作为一个国家的要求。在这种新环境下，武装团体控制部分领土、资源和人口，并在某些情况下声称对某地区拥有主权。^① 它们为当地民众提供政府提供不了的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挤压政府正式机构的治理空间。因此，武装团体在政府“治理不善、治理失败或根本没有治理”的空间蓬勃发展。^② 无法提供公共资源意味着国家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丧失。而武装团体介入提供替代治理、服务和集体利益，在此过程中能不断提高权威和合法性。据统计，从 2010 年到 2013 年，萨拉菲圣战组织的数量增加 58%，部分原因是中东和北非的治理能力显著下降。^③ 阿迈勒、真主党等武装崛起于黎巴嫩南部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忽视南部什叶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当地民众感到被边缘化。在内战频发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崛起归根结底是由于政府治理不善。研究表明，低人均收入有利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招募成员。当经济选择不佳时，年轻男子更容易选择武装团体作为庇护所和经济来源。有观点认为，贫困、人口众多以及不稳定的弱势国家是助叛乱的关键条件。^④

第三，国家权威衰落还会导致身份认同真空。国家不仅是基本物质的提供者，更是国民认同和忠诚的对象，凝聚力的象征。很多阿拉伯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通过提供物质福利，国家教育等手段，加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国家一度享有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但在这些国家，认同在传统上本就是多元的。亨廷顿就认为，“在穆斯林世界（当然包括阿拉伯国家），身份的认同呈现出一个 U 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

① Anthony Vinci, “Failed States, and Armed Groups: Reconsidering Conventional Analysis,” p. 302.

② Jesse I. Kornbluth, “Militia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s the Governance, Stupid!,” *Brookings*, July 3,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militias-in-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its-the-governance-stupid/>,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10 日。

③ Jones, 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 Jihadists,” *RAND Corporation*, 2014, p. 13.

④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 80.

教派,而对国家的忠心通常较弱,只有很少的人例外。”^①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下降,权威的衰落,会进一步导致民众的忠诚度和身份认同向次国家行为体转移。民众对次国家行为体的认同和忠诚本就长期存在,国家的衰弱唤起了这种认同。在国家无法提供完全的安全的社会环境里,次国家身份被强化能为民众带来安全感。在国家秩序重组过程中,次国家行为者和身份得到了授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民族国家”模式为代价的。围绕种族、教派、部落或地区忠诚的政治动员正在破坏该地区有争议的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就。在也门,随着社会服务的崩溃和基本商品的匮乏,地方冲突在旧政权分裂造成的安全真空中具体化,这反过来导致民族认同感的削弱。^②伊拉克 2003 年后,以教派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分享模式强化了教派忠诚的重要性。

综上,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作为能力、权威和合法性等方面衰落的国家的替代者。民众可以没有国家,但不能没有安全感、秩序和基础服务。武装团体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它们还提供了生计、归属感和权力感。

（二）霸权因素：美国霸权在中东大行其道，激发反霸力量

海湾战争及冷战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大幅增加,并开始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这一时期,“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六国和土耳其为重点,永久驻军人数从 3,000 人左右增加至 5 万至 8 万人。”^③海湾战争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持续军事存在奠定了基础。9·11 后,美国更是以反恐之名颠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随后又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两次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海湾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虽然自奥巴马之后美国不断收缩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截止 2025 年夏季,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总数在 4 万至 5 万之间,遍布超过 12 个国家。^④

冷战后的三十余年里,美国在中东形成“一超多强”的“单级”格局,依托军事力量在地区内实施的颠覆他国政权、掠夺资源、强推西方价值观、在巴以冲突中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② Peter Salisbury, “Yemen: National Chaos, Local Order,” *Chatham House Report*, December 20, 2017, p. 3.

③ 孙德刚:《冷战后美国中东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6 期,第 28 页。

④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数量、类型和位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2025 年 10 月 2 日,<https://reurl.cc/VmaLQY>,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30 日。

支持以色列等霸权行径在地区内激起了强烈的、持续不断的反美反霸主义。催生出以反美反霸为意识形态和主要目标的诸多武装团体。如直到现在仍然弱而不绝的“基地”组织就是典型的反美势力。本·拉登极力反对美军进驻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驻军,为此不惜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对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各成员而言,反美反霸反以是其战略目标、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等方面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反霸话语不仅仅是对资助者伊朗反美意识形态的复刻,也是对民意的吸纳和凝练。美国长期在中东穷兵黩武、肆意霸凌、随意扩大反恐范围,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据《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一个秘密档案显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空战一直受到包括严重错误的情报,仓促制定、不精确的打击目标,以及数以千计平民死亡(其中许多是儿童)的后果。”^①因此,反美反霸在中东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武装团体利用民众反美反霸的情绪招募成员,发展壮大。

总之,美国霸权对中东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反馈循环。美国的军事干预、民主价值推广以及对特定盟友的倾斜,在地区内不断制造安全赤字、合法性危机和权力真空,为反霸权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了存在的理由、意识形态基础和成员招募话语。美国霸权在中东一日不绝,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就有持续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三) 外部推手：外部势力支持介入,为武装团体提供助力

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崛起与域内外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几乎没有武装团体不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武装团体与外部势力结盟是互惠互利的过程。外部势力支持冲突国家武装团体有多种动机。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代理人论,外部势力将武装团体作为在特定国家实现经济、战略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利益和权力投射的工具。^②其次,外部主权国家政府为了安抚来自国内相关组织的压力,这些组织与它国的武装团体可能在意识形态、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存在联系,支持它们。如共同抗美抗以的意识形态是促使伊朗支持真主党的重要因素,尽管这

^① Azmat Khan, “Hidden Pentagon Records Reveal Patterns of Failure in Deadly Airstrik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8, 2021, <https://reurl.cc/Vma4nN>,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30日。

^② 参见 Janice E.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32; Ariel I. Ahram, *Proxy Warriors: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ponsored Militia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9; Ethan Corbin, “Principals and Agents: Syria and the Dilemma of Its Armed Groups Allies,”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35, No. 2, 2011, p. 26。

种支持并不一定有利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再次,冲突国家武装团体的目标与支持国在该国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支持国本身没有意愿或能力直接在该国采取行动实现目标时,有可能支持该国国内的武装团体实现其目标。最后,有时虽然支持国与武装团体目标并不具有一致性,但可以利用这种支持向目标国政府施压。^①

诸多域内外国家参与支持中东武装团体。在域外大国中,美国在中东扶植各类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历史久远,动机复杂多样。其一,扶植武装团体对抗战略竞争目标。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广泛扶植武装团体对抗苏联。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通过伊朗和以色列间接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牵制当时与苏联日益亲近的伊拉克政权。^②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武装各路伊斯兰武装对抗苏联。美国这种行径对中东安全影响深远,对库尔德人的长期支持使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长期面临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困扰。对伊斯兰武装的支持后果众所周知,导致了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并反噬美国自身。其二,美国扶植当地武装反恐是美军的策略之一。2001 年之后,美军动员阿富汗当地部落民兵对抗塔利班。2014 年“伊斯兰国”崛起,美国再次支持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2015~2016 年,美国在叙利亚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对抗“伊斯兰国”。^③其三,美国赋能他国国内反对派力量,间接促进政权更迭。如在叙利亚内战初期,美国向多个“温和”叙利亚反叛团体提供秘密支持,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总之,美国支持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战略是其外交政策重要工具,由美国中东战略需求驱动。尽管这种支持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特定战术目标,但给地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加剧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碎片化,助长区域冲突,侵蚀地区国家主权。而且,美国对武装团体的支持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武器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很多情况下,美国维持对代理人的控制本质上是困难的,这些武装可能独立行事,追求有背于美国利益的目标和议程。

域内国家中,伊朗是中东武装团体主要的支持者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伊拉

① Belgin San Akca, “Supporting Non-State Armed Groups: A Resort to Illegalit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4, 2009, pp. 590–591.

②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U. S. Alliance With the Kurds,” *NPR*,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npr.org/2019/10/10/769044811/a-look-at-the-history-of-the-u-s-alliance-with-the-kurds>,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18 日。

③ “Turkey (Türkiye), the PKK, and U. S. Involvement: Chronology,” *Congress.gov.*, January 10, 2025,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1380>,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15 日。

克、叙利亚、也门、巴林和沙特支持相关武装。圣城军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外分支,由国家预算提供大量资金,负责海外的支持行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2022 年伊朗分配给圣城军的资金几乎增加了两倍,从 2021 年的 80 亿美元增至 220 亿美元。^① 英国国防和安全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巴拉·希班认为,中东地区大约有 40 个由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② 伊朗承诺每年投入 7 亿美元,支持一批忠于伊朗的战斗实体。^③ 当然,伊朗远非中东唯一的武装团体支持者。如表一所示,俄罗斯、土耳其、埃及和阿联酋等域内外国家都热衷于支持中东武装团体。因此,域内外势力的支持,是地区武装团体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 技术赋能：新技术应用普及,推动武装团体发展升级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军工、通信和互联网等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不仅加强了各国军队的实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也藉此充分发展实力,增强对抗竞争对手和战略环境变化的能力。亦即,技术民主化的趋势使得相对较小的武装团体能够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与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和采购链的传统军队不同,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利用市面上可获得的技术来绕过国家的主导地位。这里以无人机和网络技术为例。

第一,无人机增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不对称战争中的博弈优势。武装无人机的运用曾是国家军队的专属领域,但现在已成为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进行侦察、打击和心理战的关键工具。无人机之所以容易被非国家行为体掌握,主要因为无人机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以及无人机技术及材料难以管控。^④ 无人机正在改变空中力量的不对称性,让天空更加“民主化”,有利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发展和保存实力。2015 年之后,武装团体运用无人机进行军事行动的次数猛增(见图 2)。

① Joe Truzman and Bill Roggio, “Profiles of 15 Iranian-backed Militias in the Middle East,” *FDD’s Long War Journal*, October 31, 2023,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3/10/profiles-of-15-iranian-backed-militias-in-the-middle-east.php>,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3 日。

② Haley Ott, “What Are the Iran-backed Groups Oper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as U. S. Forces Come under Attack?” *CBS News*, July 31,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iran-backed-groups-iraq-militias-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3 日。

③ Pierre Boussel, “The New Age of Armed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FPRS*, December 13, 2022, <https://www.frstrategie.org/en/publications/notes/new-age-armed-groups-middle-east-2022>,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7 日。

④ 马小东:《无人机与中东安全:发展及影响》,载《国家安全论坛》2022 年第 4 期,第 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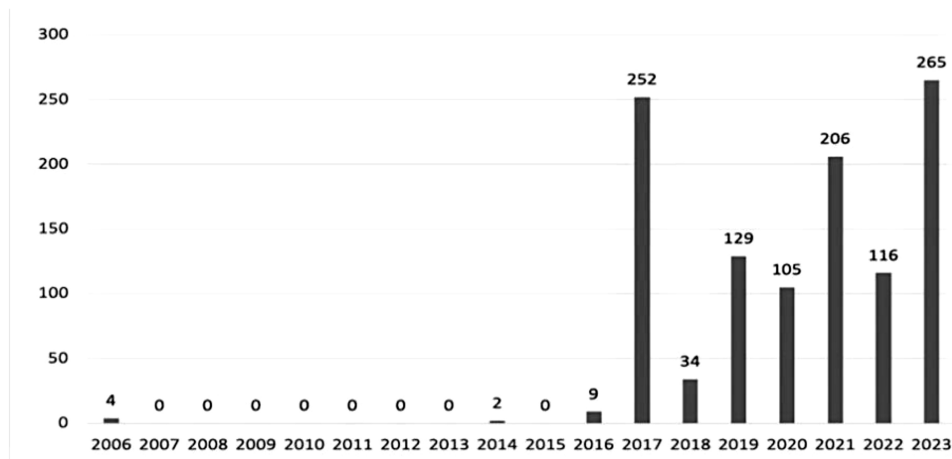


图 2 2006 年以来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运用无人机进行军事行动数量

资料来源: Håvard Haugstvedt, “Still Aiming at the Harder Targets: An Update on Violent Non-State Actors’ Use of Armed UAV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ume 18, Issue 1, 2024, p. 134.

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中,无人机都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以胡塞武装为例,自 2016 年 9 月记录到的首次袭击以来,胡塞武装已在 1,000 多起不同事件中使用武装无人机。它于 2018 年左右实现了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并取得显著军事成就,如迫使沙特和阿联酋于 2022 年 4 月接受停火。2023 年 11 月起,对红海的海上交通实施部分封锁。2024 年 7 月,向特拉维夫发射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飞行约 16 个小时,飞越 2,600 多公里,造成一名以色列公民死亡,至少八人受伤。^① 胡塞武装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它对无人机技术的重视和运用。总之,这些低成本、易改装的无人机让武装团体可以跨国投射力量、扰乱常规军事行动,并产生全球影响。

第二,网络技术增强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战和数字战能力。网络战和数字战日益成为中东武装团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大多数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并不具备国家级网络能力,但一些团体利用网络进行人员招募、组织联络甚至网络攻击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加密消息应用程序的普及,为武装团体提供了安全、难以追踪的通信方式。这使得它们能够协调行动、招募新成员、共享情报,而无需担心被国家情报机构轻易监听。这种通信的便利性极大地促进了其内部的凝

^① “Six Houthi Drone Warfare Strategies: How Innovation Is Shifting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CLED*, August 6, 2024, <https://acleddata.com/2024/08/06/six-houthi-drone-warfare-strategies-how-innovation-is-shifting-the-regional-balance-of-power/>,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1 日。

聚力和跨区域的协调能力。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武装团体进行宣传、意识形态灌输、招募和恐吓的关键工具。它们能够迅速传播其叙事、发布“胜利”视频、吸引全球支持者,并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关注,这非常有利于武装团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暗网和加密货币也为武装团体提供了秘密筹集资金和购买物资的途径,进一步增强了其运作的隐蔽性。^① 概而言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东武装团体的出现和扩散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从提升作战能力到促进宣传和招募,新技术使这些团体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运作,并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环境。

总之,无论是国家权威和能力的衰落,还是外部势力趁虚而入扶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部分中东国家建构和整合不完善,始终没有形成“强国家”以及良好的国家—社会关系。部分国家自独立以来并没有形成能够集中权威和资源的强大国家,宗教教派、部落、城市、地区、种族等次国家行为体分享着权威、资源、忠诚和认同。当这些次国家行为体掌握了拥有了武装,掌握了暴力工具,就可以从强制和感召两方面与国家争夺权威和资源,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

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中东安全的多重影响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崛起和发展会对国家内部整合、地区力量平衡以及全球安全产生深远而复杂影响。在国内,武装团体在国内构建新的安全和社会秩序,与国家展开竞争,加大本就脆弱的国家整合难度。在地区层面,其跨境行动会增加国家间冲突几率,进而引发地区力量平衡的改变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全球层面,可能会成为大国在地区内博弈的抓手,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一）加剧国内政治安全局势碎片化,破坏政权稳定基础

武装团体的存在、与中央政府的对抗,相互之间的对抗,会进一步削弱国家权威、能力和国家整合进程。

武装团体对领土的割据挑战国家的领土完整。武装割据已经成为部分阿拉伯国家突出的政治安全现象。相互竞争的武装团体划定势力范围,在特定的领土上追求一系列利益目标。由于武装团体的割据,国家领土失去完整性,深度碎

^① Andrew Cheatham, “Ho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re Changing Peace and Security,” *USIP*, June 20, 2024,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6/how-disruptive-technologies-are-changing-peace-and-security>,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1日。

片化。利比亚被一分为二,相互对峙十余年。叙利亚则一分为四,新政府在短期内恐无力整合国家领土。伊拉克已经联邦化,而且库尔德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力趋强。也门被胡塞武装、南部分离主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各执一方。苏丹很多地区处于快速支援部队和政府军的拉锯中。这些国家自独立以来,国家领土完整性从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挑战。

武装团体不仅会在领土等物理层面割裂国家,也会在社会凝聚力、国家认同等方面造成难以消除的裂痕。武装团体的崛起,或以特定种族为基础,或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或以宗教教派为支撑。武装团体的人员招募、政治动员和对外作战等活动会强化种族、意识形态、宗教和教派等界限,威胁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即使武装团体最终式微,它们所引发的这些社会裂痕仍将困扰着国家重建。

自 17 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发轫以来,武装团体一直在与政府争夺对人民的影响力。^① 武装团体在所控制领土上的有效的思想和治理实践,最终形成的是对国家合法性的挑战,会长期削弱国家主权和权力,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规范提出了重大挑战。武装团体破坏了该地区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

(二) 引发更多跨境冲突,冲击地区边界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受制于核威慑的相互保证毁灭(MAD)原则、国际社会对和平解决争端的规范建构,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存深化等因素,主权国家之间直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频率确实趋于下降。然而,这种和平趋势的背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作为一个能够引发或升级国家间战争的关键因素,其作用却在国际安全格局中不断凸显。

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使其成为地区安全与地缘政治秩序的重大冲击源。它们活跃在中东等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其行动的跨境化正在成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的主要传导机制。武装团体在国内通常处于现有国家的对立面,寻求政权更迭、自治或独立;在国际上,它们游离于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和规范之外,不受制于约束国家行为体的各种制度,包括《联合国宪章》、各种军备控制条约或国际人道主义法。这种“法外之地”的地位赋予了武装团体极高的军事行动灵活性,使其能够采取一些主权国家

^① 参见 Max Boot, *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Liveright, 2013; Robert B. Asprey, *War in the Shadows: The Guerrilla in Hi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4.

难以直接实施的、具有高风险的行动,从而引发出其不意的国际争端。

随着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武装团体的跨境活动更为频繁,包括走私、招募人员、寻求庇护或对邻国目标发动袭击等。这种跨境行动直接威胁到邻国的主权和国内安全,必然引发被袭击或被渗透国家的强力回应,例如越境打击、军事干预或经济封锁。这种回应往往会使原本局限于国内或低烈度的冲突迅速升级,并将更大的政治单位卷入冲突,甚至形成代理人战争结构。许多武装团体与外部大国或地区强国维持着紧密的代理人关系。当武装团体采取激进行动时,其背后的支持者可能被视为间接参与了冲突,这极大地增加了国家间误判和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联系使武装团体成为撬动地区力量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杠杆。

从中东安全现实可知,武装团体有能力通过对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跨国挑战将国家直接带入冲突。^① 此类案例在中东比比皆是。如在叙利亚内战期间,阿萨德政权与真主党联盟自2012年底以来不断在叙利亚开展活动;2015年沙特领导的联军向胡塞武装宣战后,胡塞武装跨境打击沙特境内设施;2017年以来,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击败“伊斯兰国”并在伊拉克站稳脚跟后,开始向叙利亚输出战斗人员并声称保护叙利亚冲突中的什叶派少数民族^②;2023年10月以来,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打击同样也会引起以色列对也门的轰炸。因此,随着武装团体跨境行动增加,它们作为冲突催化剂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它们频繁挑战周边国家主权,传统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概念受到侵蚀,加剧了地区秩序混乱。

(三) 加剧地区大国竞争,激化地缘政治矛盾

冷战期间,中东就是美苏利用代理人进行竞争的主要场域之一。彼时,大国代理对象主要是主权国家及国家正规武装力量。^③中东在经历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独步天下的时代后,正重新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和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带。^④ 鉴于

① Dominic Tierney, “The Future of Sino-US Proxy War,”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4, No. 2, 2021, p. 50; Idean Salehyan, “The Delegation of War to Rebel Organiz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3, 2010, p. 494.

② Fanar Haddad, “Iraq’s Popular Mobilization Units: A Hybrid Actor in a Hybrid Stat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Report*, 2020, p. 37.

③ Candace Rondeaux and David Sterman, “Twenty-First Century Proxy Warfare,” *New America Report*, February 2019, p. 29–31.

④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第5期,第58页。

直接冲突带来的高风险和高成本,代理人战争仍然是大国竞争的主要策略之一。^① 与冷战期间所不同的是,21 世纪以来中东广泛存在、能力不断发展以及具有异于主权国家的特征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正在改变大国代理人的形态、代理逻辑和代理人偏好选择。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仅在竞争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可能成为大国战略的驱动者。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作为大国战略竞争工具,可能成为大国在中东进行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相较于主权国家代理人,不受国际法或任何法律约束的武装团体更加灵活,它与委托国家间模糊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为委托国提供更好的可否任性。武装团体物理形态的隐蔽性和战略战术的灵活性能为对手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而且还能够长期骚扰和挑战敌人,地方武装也提供了现成的地方专业知识,这是主权国家军队难以做到的。

目前,中东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外部参与大国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武装团体代理人在它们过去十年里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虽然在中东有庞大的军事基地体系,常年保持着大规模驻军。但近年来美国参与中东军事和安全行为来看,主要方式仍然是运用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代理人战争。利用本地武装团体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优势之一是减少竞争者在道义上的风险,当地民众不会将他们视为入侵力量。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放弃利用大规模常规战争塑造中东秩序,降低维持中东霸权的成本。面对非传统、非对称的威胁形态,美国不断调整中东安全战略和作战方式,逐渐转向扶植地方层面的非国家代理人,依赖后者“本土化”优势,以非对称方式应对非对称威胁。

早在占领伊拉克期间,美军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地方民兵支持,如与“伊拉克之子”以及逊尼派“觉醒”运动民兵合作。^② 2013 年开始,美国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方式主要是利用武装团体的代理人方式。当时奥巴马政府授权 CIA 在叙利亚开展代号为“梧桐木计划”(Timber Sycamore)的行动,支持反对派武装。2014 年,美国开始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库尔德组织对抗“伊斯兰国”。2014 年打击入侵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美国也是通过支持当地武装的方式。^③

①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13, p. 7.

② Omar Al Nidawi and Michael Knights, "Militias in Iraq's Security Force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U. S. Options," *Washington Institute*, February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df/view/2408/en>,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3 日。

③ Frederic Wehrey, *The Burning Shores: Inside the Battle for the New Liby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 240.

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主要在叙利亚和利比亚。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运用代理人的动机更加明显。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在中东地区武装或以其它方式赋予代理人权力符合俄罗斯的策略。^① 俄罗斯也是利比亚局势的主要外部参与者,它与割据东部的军阀哈夫塔尔建立了特殊关系,哈夫塔尔被认为是俄罗斯在利比亚的代理人。在苏丹,俄罗斯支持支持快速反应部队与政府军对抗。

除域外的美俄外,中东域内的伊朗、土耳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会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区域内相互竞争。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战争凸显出域内外大国都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建立了广泛联系,以及武装团体在当今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大国的非国家代理人战争策略偏好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崛起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总之,非国家武行为体内部安全联盟在塑造国家内部和国家间权力斗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国内冲突,还是国家间冲突,武装团体都在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

五、结语

中东地区很多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完全的主权国家,缺乏持久强大的中央政权、无法垄断国内暴力、对内发展经济不力,对外依赖严重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为游离于国家正式权力结构之外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它们不断出现于国家权力未覆盖的时空。中东地区国家体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渗透性,催化了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反体系运动。

21 世纪以来,由于苏丹、黎巴嫩等国长期冲突、美国颠覆伊拉克政权以及 2011 年中东剧变的出现不仅为原有老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提供了更多生存空间,还催生出更多新的武装团体。无论是旧武装,还是新武装,在全球化和武器高科技化的加持下,发展出更强大的综合能力。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中东正在被挑战,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填补国家功能空白,甚至构建地方性秩序。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作为理解冲突和国际安全的主要载体,可能已不再是最佳的选择。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崛起,导致中东地区安全

^① Anna Borshchevskaya, “Countering Russia’s Strategy of Arming Anti-American Proxie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ugust 2, 2024,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countering-russias-strategy-arming-anti-american-proxies>, 上网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形态呈现出“范式性转变”。它们的崛起在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博弈规则。其跨境行动、混合战手段(如网络战、代理人战争)迫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主权边界与冲突管理机制。

中东国家机构无法稳定区域秩序,暴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在数量和能力上的增加引发了多层次的安全问题。在国内,通过提供安全、服务和价值观重塑社会认同,形成与国家并行的治理实体,与国家争夺或分享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在地区内,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通过跨境暴力行为、参与地区热点冲突和占据关键战略要地等行为撬动地区安全局势。这都导致它们开始在区域安全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碎片化与地区结构失序的长期化,可能催生更多“失败国家”与“平行治理”模式,进一步冲击全球安全架构。中东的案例表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已从边缘行为体演变为地区秩序的核心变量。其双重角色——既是安全威胁,又是地方秩序的构建者——要求学界与政策制定者以更复杂的视角审视其影响,并在国际规范与现实策略间寻求动态平衡。中东地区广泛存在并能够实施国际行为的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它们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却能在区域内投射力量,对地区国家的主权构成挑战,深刻影响了中东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

因此,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非常突出的政治安全现象。对武装团体的研究既具有学术重要性,也具有政策重要性。在学术方面,对中东安全的研究,需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纳入核心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其组织逻辑、战略互动及其在冲突中的作用。在政策方面,国家对外政策中需要考虑如何与没有主权的武装团体互动,随着它们影响力的增长,不得不成为需要与之互动的对象,而且在很多国家,武装团体往往是影响战后国家重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中东地区是近年来武装团体不断涌现并发挥作用最突出的地区之一。这给中东地区事务参与者提出了挑战,国际行为体需要考虑如何在不违背国际规范的情况与这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互动。至少不能一味地将中东武装团体视为威胁和敌人,这无助于实现中东地区安全。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